

从 来 燕 赵 多 奇 女

——郭沫若致赵清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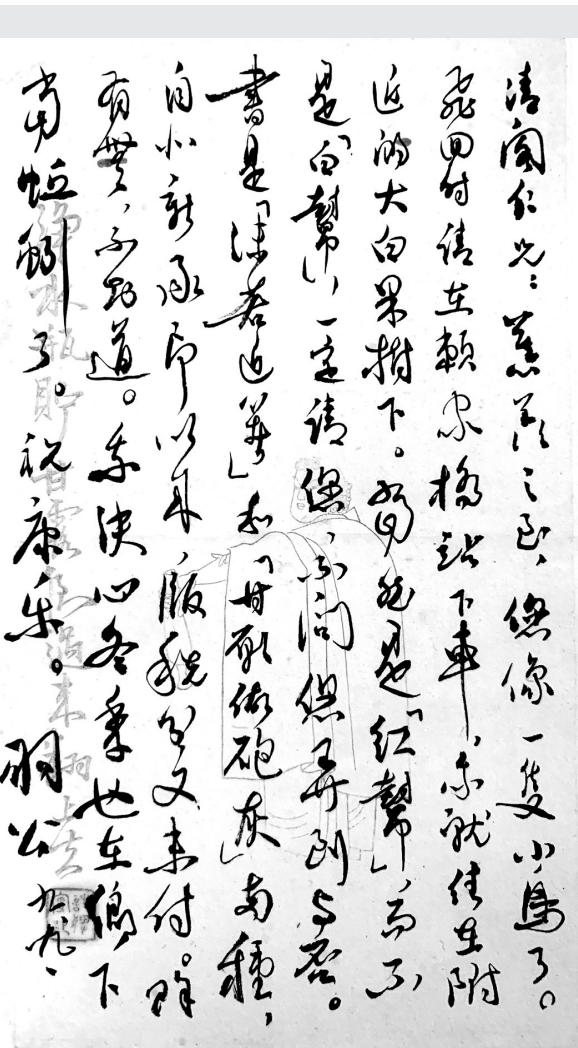
三四十年代的名作家中，才女赵清阁，集编辑作家于一身，还能画，故很受大家的喜欢。但论其知名度，当然与郭沫若、茅盾、老舍、梁实秋等大名家没法比，即便和同样女作家的冰心、丁玲相比，似也稍逊一筹。然而，这些文坛“大咖”却都和赵清阁关系亲近，持有很深的友情，他们不仅时相过从，还有尺牍与诗书画的往还酬唱。我想这自然有赵清阁为人洒脱豪爽的个性因素，让人容易亲近，也让年长于她的一些名家都觉得她可爱。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，那就是赵清阁一直都是单身。正因为单身的优势，所以赵清阁与大家都玩得很好，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，直到终老。而反之，如果女性有了家庭，相夫教子为首要任务，那么与外界的交往必定减少。在过去那种以男性为主的社交群中，相对而言，单身的知识女性是“稀缺资源”，何况赵清阁这样有豪情、善饮酒的才女，无疑更令人愿意交往。

剧作家田汉就有一首《登缙云山赠赵清阁》的诗，如此描写了他们眼中的清阁：“从来燕赵多奇女，清阁翩翩似健男。侧帽更无脂粉气，倾怀能作甲兵谈”。写剧本，画国画，编杂志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也许她身上的豪侠之气，如“侧帽更无脂粉气，倾怀能作甲兵谈”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，就是一种“女汉子”的风格，大家都与她具有“兄弟”一般的友谊。那时她主编一本抗日救亡的杂志叫《弹花》，办刊的宗旨是“大敌当前，抗战第一”，刊名则意谓“子弹开出的花”。此杂志先是在武汉创刊，后因武汉战事吃紧，《弹花》仅出了一期，赵清阁就将杂志带到了重庆，靠她一人约稿编辑写稿，在重庆发行几期后产生很大的影响，“弹花如雨天河南”即是针对杂志因宣传抗日带来的影响渐大而言，郭沫若也有“豪气干云霄，锦心一弹花”的诗句，来赞美赵清阁与她的《弹花》。不过，所有名家中，为《弹花》出力并写稿最多的，还是老舍。

关于老舍与赵清阁，如今也用不着忌讳，其实很多人都知道，他俩在重庆曾有一段叫人扼腕感慨的恋情。老舍先于山东齐鲁大学教书，抗战起后他只身南下奔赴武汉，翌年又转到了重庆。那时的赵清阁二十四岁，正是具有成熟魅力的女子，而老舍已三十九，在过去这应算是人到中年吧。他俩在编辑约稿以及合作剧本的过程中，终于生出了爱情而走到了一起。老舍的妻小一直在北京，赵清阁由于自小失去了母亲，又与继母不睦，十五岁时就屈辱地出走家庭，独立在外求学。因此她有豪爽热情的一面，也有孤独无助的一面；作为单身女子，她有一颗渴望被爱的心，也有一颗自尊而敏感的心。这一切大概也没几天，随着老舍夫人胡絮青突然携子从北京赶来了重庆，赵清阁则选择了退出……抗战胜利后，老舍赴美国讲学一年。据说他曾有计划接赵清阁出来，逃离现实生活，远赴异国他乡生活，但赵并没接受他的计划，相反还写信劝他回国，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事业：……这一回，也间接导致了老舍以后的人生悲剧。

老舍与赵清阁的恋情故事，两位当事人都未述说。赵清阁晚年虽写有五部回忆文集，但没有一篇提及老舍。不过，赵清阁在一九四七年曾写有一篇小说《落叶无限愁》，讲述抗战胜利后，一位滞留大后方的中年教授邵环、与年轻女画家灿相恋，本以为可以终成眷属，但面对已有家室的邵教授，灿只得悄然离开。邵教授又赶往上海寻到灿，可得知邵妻将追到上海，灿再次消失，“邵环倒在泥泞中，落叶寂寞地埋葬了他的灵魂……”

这虽然写的是小说，但基本就为他们的恋情做了完



郭沫若致赵清阁信，1943年11月。原刊于《沫若集》，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。此信为郭沫若写给赵清阁的，信中表达了对赵清阁的欣赏和思念之情。

美的注脚。赵清阁晚年，将齐白石、傅抱石、刘海粟等国画大师画给她的作品，都捐赠予上海博物馆。最后，又将一大批文化名人的书信题诗、册页条幅等，捐给了上海图书馆。不过，赵清阁是将书信整理后捐赠的，其中虽也有老舍的一些信，但涉及更敏感的内容想必都已销毁了。赵清阁编有一本《沧海往事——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》，后二〇〇六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书中收老舍的信不多，仅四封，皆写于五六十年代的。而多的是丁玲、茅盾和施蛰存等。这些都是赵清阁留存的现代名家写给她的书信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，现都珍藏于上海图书馆。其中也有赵清阁的画和毛笔题的诗句，但没有赵清阁的信。不过我倒藏有一封赵清阁的信，并有实寄信封，以钢笔书写，寄给中国妇联的一位朋友。可能是她写的随意，照此信来看，赵清阁的钢笔字实在不及她的毛笔书法，这也并不奇怪，她毕竟专业学过绘画，年轻时读过河南信阳艺术高中，还还在上海美专学过西洋画，运用起毛笔来也具有一定的功底。

在武汉和重庆时，赵清阁与郭沫若也很熟。她中学时代就拜读郭沫若的《女神》等名篇，景仰郭的才情。后由仰慕而拜识，并进而交往。郭沫若则当她是可爱的小妹，听说她也有投身革命的向往，便写信告诉她“我们这里是‘红帮’，近朱者‘赤’，你怕吗？”不料生性豪爽的赵清阁却回答道：“就是近郭者宰，我也在所不惜！”《沧海往事》一书中收有郭沫若的书信六封，都是写于四十年代的重庆时期。其中写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的如下：

清阁仁兄：慕美之至，您像一只小鸟了。飞回时请在赖家桥站

下车，我就住在附近的大白果树下，当然是“红帮”，而不是“白帮”。一定请您，不问您弄到与否。书是“沫若近著”和“甘愿做炮灰”两种，自北新承印以来，版税分文未付。余有文，不知道。我决心冬季也在乡下当蚯蚓了。祝康乐。

羽公 九、九

郭沫若写信也犹如写诗，什么“像一只小鸟了”之类的语言，若是王国维、陈寅恪的书信中，肯定不会出现。那时的郭沫若，在重庆赖家桥主持“文化工作委员会”，该会名义上属于国民党军政治部，但实际上是受中共的控制和领导，周恩来就是该政治部的副部长，故信中说是“红帮”。因为赵清阁当时受聘成都中西书局，要为该书局编一套“中西文艺丛书”。郭沫若听说赵清阁到了成都，便写信委托她，代向北新书局催讨他的《沫若近著》和《甘愿做炮灰》两书的版税。我曾写过一篇关于许广平与北新书局打官司、催讨鲁迅先生版税的文章，看来北新拖欠作者稿费绝不是偶然的疏忽，而是该社惯用的“套路”。

此函的落款为“羽公”，这其实并非郭沫若的笔名，而是他与赵清阁通信时偶尔兴起所用的称谓。这和赵清阁与老舍之间通信时用“珊”和“克”互称是一样的，若非当事人注释，就成了外人很难破译的书信“密码”。郭沫若之所以自称“羽公”，是缘于赵清阁给他写信时称他为“沫翁”，因此郭沫若开玩笑地回信说：“你称我为翁，我还没有老呢。”羽公’，就是‘翁’字上下结构的位置对调。你看我这个老翁还能在你面前翻个跟头，你看我老不老？”

面对年轻的女孩而不愿服老，这大概算是有想法”的一种表现。

郭沫若作书或作文，其实都具有才子气。这封信看起来也是文不分段，一气呵成，流畅率意但缺少文气。郭沫若写字基本也是如此，他发挥得好与坏，会有很大的落差。所以，赞其字好的，夸他是洒脱豪放，功力深厚风格强烈，奉为“郭体”；鄙视他的，评他的字粗疏狂野，有媚俗之气。最著名的一例，是说康生非常瞧不起郭沫若的字，称自己“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”。不过依笔者来看，康生虽擅长草书，描摹仿宋体，但其字拘谨小器，格局全无，这恰好与郭沫若的洒脱大气相映照，若是以郭非应酬的书法相比，无论从笔墨技巧还是格调上，应该都不在一个档次。

通常我们所见的郭体书法，多以行草或草书见长。不过在早期，郭沫若的书法却是学的苏东坡，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曾有诗赞郭老书法，曰：“郭公余事书千纸，虎卧龙腾自有神。意造妙参无法度，东坡元是解书人。”但后来郭的字却得颜体最多，他自己也曾言于“颜字”下过功夫，其宽博的造型以及横较竖重的笔画质感都受颜书之影响，他的“回锋转向，逆入平出”八字要诀，展示了他线条凝重苍厚、用笔起落急缓而富于变化的风格。

近年来人们对于郭沫若的人品时有诟病，因为历来人们就对顶尖大文人有道德上的要求，希望他们纯粹、清高，可以垂范天下。然而文人一旦参与政治，或过于热衷政治，人格总难免会有瑕疵，也很难真正做到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的。郭沫若的问题有他自身性格的原因，也有历史环境的因素，其实每个人都是多面的，郭沫若作为文学、历史、考古、戏剧、翻译等诸多领域都有着不俗而骄人的成就，如果因人废学或废才，那都不是客观的态度。抗战胜利后赵清阁欲由重庆返回上海而没有盘缠，只得于街头设摊变卖自己的物品，那次恰好被郭沫若撞上，不仅买下她的口琴，还让赵清阁回家画了几张画，由他题了字后并托人全部带去，解了赵清阁的燃眉之急。在赵清阁的眼里，郭沫若不就是一位慷慨善良、急公好义的老大哥嘛！

人生如树花同发，随风而散，或坠茵席，或落粪溷。自降生那一刻，人生这部大书很多章回都已写定，不容选择，亦难作大改动；外貌、智商、性格、家庭、环境、时代、……不过在这些被给予之物中，有一项是极易改换的，那便是你的名字。

好名字固然能带来成长中的积极暗示，油然而生“锡余以嘉名”的自豪。遇上坏名字也不必难过，了不起到派出所改一下，无需动手术。然而我们常出于孝道观念，不太愿意拒绝父母长辈在名字上的这份寄托。例如吾家文公，文起八代之衰，名讳曰“愈”，不见于许祭酒的《说文解字》，便招来清代学者王鸣盛的非议。他在《问字堂集序》里推测，韩文公之所以未改名，是因为“昌黎孤故也”，父亲早亡，“君子已孤不更名”是一种美德。近代哲学大师亚瑟·叔本华(Arthur Schopenhauer)也遭到伊格尔顿(Eagleton)的嘲笑，因为叔本华是高贵门阀的姓氏，而亚瑟之名则相当市井气，放在一起不伦，至于叔兄何以不改名则无从考证了。

若不欲更改户籍之名，则可通过取字、号、别名、斋号等方式“曲线救国”。书画家尤其喜欢取字号，因为他们倚赖名气吃饭，又要经常落款，没有一个风雅的名字实在难受。一般来说，“字”较为固定，“号”则比较自由，不妨“朝三暮四”。常见到当代书家的自我介绍里，除了爱标榜虚衔外，就是喜欢罗列别号，密密麻麻一大堆，其实易给人不庄重的感觉。须知“字”是言志的，“号”是抒情的，古人号“东坡”、“放翁”、“稼轩”都有点牢骚不平之意在焉。性情中人固然对艺术创作有益，但尚未臻平和与自然之境，号不宜太多，更不宜标榜。

姓名之学在古代算不上学问，只是一种常识罢了。近现代以来，传统衰微，然书家于此仍有所留意，这方面的典型是沙孟海先生。1926年，沙孟海27岁时已发表《名字别号源流考》一文(《东方杂志》25卷七号)。沙老一直关注姓名学，尤其注重篆刻边款的落款方式，守古法而不为晚近习气所染。当代人于传统学问、常识欠缺厉害，给予女取个名字不伦不类，书法家亦在所难免。同时又有所谓取名社、取名公司之类，凭游谈无根、欺世惑众的所谓“理论”，炮制出的名字毫无章法，稀奇古怪。这方面，我们不妨从近现代书坛前辈那里多汲取些养料，以丰富姓名之学的常识。兹以十位海派书家为例，略谈其名字由来与寓意，或有疏漏之处，聊供诸君饭馐一餐耳。

沈曾植（1850—1922），字子培，号翼斋、乙龠、乙龠、李乡农、睡翁、城西睡庵老人、东轩支离叟等，晚号癯瘦、巽斋老人。据《沈增植年谱长编》汇录，沈老别有近百个，斋名也有近百个，可知其平日挥毫落款之际，颇欲以别号寄托情愫。“曾”为沈氏班辈，沈曾植伯兄名曾荣，仲弟曾桐字子封，季弟曾樾字子林。“子培”之“子”为男性美称，如曹植字子建、赵云字子龙、王勃字子安、杜甫字子美、赵孟頫字子昂等。“子培”之“培”与“植”为近义词，种植后必栽培之。名、字之间取近义是古代最常见的，如颜回字子渊、宰予字子我、班固字孟坚、周喻字公瑾，不胜枚举。“巽斋”之“巽”出自《周易》巽卦，《巽卦》象曰：“随风，巽；君子以申命行事。”巽象风，其德为人，柔、顺，寓有卑顺谦逊、宽容大度之义。

李叔同（1880—1942），幼名成蹊，学名文涛，字叔同，出家后法名演音，号弘一，别号无住、深心、息瞿、霜翁、焰慧、晚晴老人等。“成蹊”出自司马迁《史记》：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”“文涛”喻文才如江海，晋时陆机、潘岳齐名，钟嵘《诗品》云：“陆才如海，潘才如江。”后人论文，又谓韩愈如海，柳宗元如泉，欧阳修如澜，苏轼如潮。“叔”，表示排行，所谓“伯、仲、叔、季”。古代以叔为名字者甚多，商朝有叔齐，周周卫康叔，春秋鲍叔牙，三国魏叔夜，宋代欧阳永叔，直至清代书法家赵孟頫。“同”是个好字，《周易》有“同人”卦，《礼记》有“大同”之说，古时四方诸侯朝见天子也叫“同”。宋代有位医学家雅祥，字叔同。北宋宰相词人晏殊，字同叔，正好倒一倒。

沈尹默（1883—1971），原名君默，别号鬼谷子，斋号秋明室。沈尹默在北大时沉默寡言，友人建议其去“君”下之口，遂改名尹默。“君默”本出自《周易》系辞》：“子曰：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。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”刘向《说苑》也说：“君子之言寡而实，小人之言多而虚。”秋明盖指月亮，出自韩愈《秋怀》诗：“悠悠偃宵寂，亹亹抱秋明”，此诗又有“洁思避语阱，冥忘触心兵”之句，甚合君子寡言慎行之旨。

王遽常（1900—1989），字绥仲，又名彦洙，端白、用里翁、玉树堂主、欣欣老人等，斋号窈窕轩。王遽常降生时，其父正读《史记》仲尼弟子列传》，故中有遽伯玉，是孔子的朋友。遽伯玉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“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”。遽伯玉名瑗，便以遽为名，以瑗为字，常为班辈，仲则行二。此种取名法类似南宋诗人陆游，有一种说法是其母梦秦观，遂以秦观之命名字务观，秦观之字少游名游。王遽常同时有学者钱仲联、名萼孙、号梦苕，二人名字皆有“仲”，故有合刊诗集《江南二仲集》，名噪一时。“二仲”之名追慕汉代以廉洁著称的羊仲、裴仲，自从陶潜说出“但恨无邻二仲”之语，“二仲”便成为好邻居的代称。王遽常“明两”之号，取自《周易》离卦：“明两作，离，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”；号“端六”，则因生于端午后一日；晚号“欣欣老人”，取自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：“木欣欣以向荣”；号“窈窕轩”，取自龚定庵《己亥杂诗》：“九月犹开窈窕花”。

●韩立平海派书家名字捭谈

海派书家名字捭谈

（上接第2版）

来楚生（1904—1975），名稷勋，字楚生，以字行，又号然犀、楚凫、负翁、一枝、非叶、怀旦等，斋名安处楼、然犀室，晚年易字初生。“稷勋”，功勤于社稷，表达了人生事业的期许。来楚生篆刻自用印一方：“生于鄂渚，长于浙水，游于沪滨。”来楚生是萧山人，出生在湖北，故名“楚生”。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国立都于丹阳(湖北秭归)，后定都于郢(湖北江陵)。

潘伯鹰（1904—1966），原名式，字伯鹰，后以字行，号逸公、有发翁，即曲云、孤云等。《说文》：“式，法也。”有法度、楷模、榜样之义。以式为名，汉代有愿输一半家财以助朝廷抗击匈奴的卜式，唐代有以笔记小说著述的殷成式，五代时有书法家杨凝式。凝式即是成式，成为格式，《周易·鼎卦》云：“君子以正位凝命。”式还有车前木之义，宋代大文豪苏轼的“轼”，与之为古今字关系。“伯”表示排行第一。以“鹰”为名字者，古有见秋风起而思鲈鱼莼羹的张翰，字季鹰。

白蕉（1907—1969），本姓何，名靛，又名法治，字远香，号旭如。后改为白蕉，字献之，别署云间居士、济庐复生、复翁、纸愚墨庵瘦忘老人等。以“法治”一词为名，颇有现代气息，似未见古人用过，远不如白蕉具有艺术味道。白蕉之名，乃取自其情人所赠白色美人蕉。改名白蕉后，“何”姓遂废，好在白蕉藕有几片叶子，故在白蕉藕有几片叶子时，算是铭记自己是何家人吧。

谢稚柳（1910—1997），原名稚，字稚柳，后以字行，晚号壮暮翁，斋名鱼饮溪堂、杜斋、烟江楼、苦篁斋。谢稚柳为武进谢仁湛之次子，长兄谢颀庵，字玉岑，工倚声，亦擅书画。古代名字除以“伯、仲、叔、季”表示行辈外，汉代以后又以“元、次、幼、稚、少”等命字。谢稚柳为幼子，故以稚为名，历史上含有稚雅的名，如文学家孔稚圭，魏晋壁偷光的匡衡字稚圣，《抱朴子》作者葛洪字稚川。“稚柳”为古诗词常见意象，如周邦彦《西厢乐》：“稚柳苏晴，故溪歇雨。”曼妙的“柳”并非女子专利，《晋书》：王恭传》载王恭“姿美仪，人爱悦，或目之云：濯濯如春月柳”，后代诗文多以“春月柳”形容男子，“春月柳”就是嫩柳、稚柳。

胡问遂（1918—1999），问遂取自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迷者不问路，弱者不问途，亡人好逸。”意谓问向水中可涉之途，喻多向贤者请益求教，亦作“问坠”。《晏子春秋》杂上二十）：“溺而后问坠，迷而后问路，譬之犹临难而遽铸兵，噫而遽抽并，虽速亦无及已。”

程十发（1921—2007），名潼，斋名有步鯨楼、不教一日闲过斋、三釜书屋、修竹远山楼。《说文》：“程，品也。”十发为程，十程为发，十分为寸。”程、发皆是微小度量单位，取名“十发”乃是一种自谦。发字繁写为髮，不可写为發。

父母希望给予女好名字本无可厚非，而当代人好取双名，往往挑最好最炫的字眼凑在一起，不讲章法，仿佛七宝楼台招人眼目，碎拆下来不成片段。须知天地本不全，名字上亦不必求全责备，占尽好处。寓意有点不俗，搭配得自然，叫起来不拗口，也许就是最好的名字了。

讠告

△上海市书法协会会员黄迺人先生于2018年11月19日20时36分因病在张家港第六人民医院逝世，享年81岁。

●徐宏斌

上海市书协新一届主席团第一把火

首先，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在换届之后，第一时间公布《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自律公约》(详见第一版)(以下简称：自律公约)点赞。

《自律公约》第一条是说服务人民，属于工作导向问题，也是根本性的方向问题。这一条，也将明确书法家协会未来的主要工作思路。

第二条强调班子团结，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，说明这个问题很重要，大家都意识到。班子团结，才能有凝聚力，才能合力前行。而且刚刚换届完成，如此强调，也是很有必要性。第六条是第三条的延伸。团结的前提，是立足集体利益，避免小团体小圈子。小圈子盛行，整个团队怎么可能团结，怎么可能有很强的凝聚力、向心力？海派书法的新发展，首先建立在大团结的基础之上。既要海纳百川，在艺术上保持百家争鸣，又要保持集体的团结性，即所谓“君子和而不同”。

第三条、第四条，应该说是有开创性意义的，也是各级书协组织之前被群众诟病较多的地方。尤其是第四条，希望可以领新风气之先。众所周知，每次大型展览，书协的主要领导几乎集体置顶(既包括展厅，又包括作品集)，而且还要照顾不同的身份、职位，不仅活动主办方累心，观众也累心。有了现在这条规定，接下来的各类书法展将减少“行政”味道，回归艺术本身。

第五条、第七条，强调正确的义利观、价值观，强调服务社会。内容也提在了点子上，在当下很有现实的必要性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，不应仅是上海书法的“服务者”，还应是模范带头人。上行下效，主席团成员不做好表率，整个行业风气如何改善？

新一届上海市书协班子以这样一份《自律公约》开启履职之路，而不是一上来就大讲宏伟蓝图，这也应该看作是一个积极的信号：上海市书协意识到树立行业风气的重要性。作为书法工作的专业协会，主席团先立约，再做事。把讲正气、树正风、走正道放在首位，这是充分正能量的开端。我们也期待新一届上海市书协主席团能成为既团结又有担当的一届，有使命感，有责任心，真正做到加强职业道德建设，树立行业新风气，团结广大书法工作者，齐心协力，为实现海派书法新的繁荣作出贡献。

●王德彦

海派书家捭谭(二十七)——白龙山人王一手

为什么要在题目中明确“白龙山人”？因为在海派书画家中，有两个王一手。一个是《海上墨林》记载的王一手，名钟，字一手，乾隆时人，“书法二王，善摹大字”。另一个是我们大家经常提起的王一手，名震，字一手，别号白龙山人，画人物神似鸢鸢，与吴昌硕有深交。清末民初，白龙山人王一手与吴昌硕成为海派画家的代表人物，时称“海上双璧”。此王一手非彼王一手，乃白龙山人是也。王一手有这样一段趣闻轶事：有人指画上署名问他为何写“白龙山人”？其实这是因为王一手家乡吴兴北郊有白龙山麓，故以白龙山人号为。但王一手却笑着回答道：“我的书画有收受润笔，有些是他人所托，并不收润，其非‘白弄’，故名白龙山人。”闻者为之失笑。此是他一时戏言，不料消息传出，书画市场上就有了区别：凡具“白龙山人”的画，价值低廉，而具“吴兴王震(一手)”真名的，画价较高。这种市场风云突变是王一手始料不及的。

笔者十分好奇，这样一位海派名家，《海上墨林》为什么失收？是因为两个“王一手”不好区分吗？显然不是。因为凡《海上墨林》记载的书画家，皆是名、字、号齐全，不存在区分的困难。是因为此王一手的名气不够大吗？当然不是。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此王一手的名气：与吴昌硕、任伯年、张大千、孔祥熙、杜月笙等密交，可谓是在上海滩上呼风唤雨的人物。1922年世界级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抵达上海，王一手设家宴招待，于右任等人作陪。此等荣耀上海滩上恐怕是无人可比，全国也仅此一人。王一手还是多个书画社团的发起人。是因为杨逸与王一手不熟悉吗？非也。两人有过密切的共事经历，王一手有据可查的有：1909年3月豫园书画善会成立，王一手与杨逸一同是发起人，王一手是会长。1923年4月，西湖有美书画